全媒体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解构与重塑

范慧君
（合肥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全媒体视域下不同媒介的深度交融、媒体发布通道的多样性，为公众信息获取提供了较大便利。【目的】公众借助网络平台不仅能获取实时信息，同时还能在其中交流和互动，实现压力的释放。但需注意的是，全媒体视域下的自由性、多元化的表达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社会安定和谐，以及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方法】文章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结果】通过对全媒体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解构成因、重塑举措进行详细剖析，提出了一些可行性较高的举措。【结论】这些举措是打造全媒体信息交流与良性互动格局，重塑有序健康的网络公共空间的有效方式，希望能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全媒体；媒介；网络公共空间；解构与重塑；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G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3）03-063-04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03.013
本文著录格式：范慧君．全媒体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解构与重塑 [J]. 中国传媒科技，2023（03）：63-66.

导语

全媒体视域下网络受众的主动性、互动性、个性化极大凸显，媒体碎片化和受众的碎片化愈演愈烈，信息垄断的局面不复存在，大众媒体的引领性和聚集性日渐式微，媒体深度融合时代下受众利用多种媒体终端进行信息的交换和索取，从中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和心灵慰藉，自由表达个人的需求并及时地反馈信息，逐渐成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然而“人人是媒体，处处在传播”的局面亦不断解构着网络的公共空间，极易滋生谣言和网络暴力，产生诸多社会问题，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分析，这个被现代传媒“全球化”了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上被重新组合、从而高度“抽象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可供信任的秩序，反而是在“抽离化”的过程中导致了一系列危机的出现[1]，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进步，因此网络公共空间环境的治理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1. 全媒体语境下公共空间解构的成因

1.1　负面信息的大肆传播污染了社会风气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人们的负担和压力日益加重，人际关系日渐弱化，情感变得淡漠，人们更加渴求获得轻松愉悦、颠覆常规甚至低级趣味的东西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释放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不满情绪，而负面信息的特征恰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负面信息通常指不好的、坏的、消极的一面；以适合于通信、存储或处理的形式来表示的知识或消息。在网络方面又可称为：负面消息、负面新闻、网络危机等。[2] 尤其是全媒体时代使负面信息具有持久性，并以几何数产生负影响，迅速形成许多“手机控”“电脑控”“微博控”“键盘侠”等群体，他们既是信息接收的主体，又是传播的载体。处于这种境况下的繁杂信息因缺乏把关人的监管，打破了传统空间的议程设置，导致信息失控、裂变式传播，整体传播环境日渐恶化，加之负面信息报道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使民众的理性思维能力下降，道德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社会责任意识淡漠。浙江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教师颜艳红把以虐待儿童取乐的照片传到网上引起人们热议，虽然事件以肇事者涉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而告终，但是其影响极大，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给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此事件引发的思考一方面是幼儿的心理伤害需要时间平复，另一方面不禁促使人们去思考犯罪者的行为成因及行为背后的心态，是否源于社会道德及价值观的解构，网络媒体的警示、教育或规范等正向引导功能是否太过薄弱所致。

1.2　虚假信息的日益泛滥破坏了媒介规则

日本学者竹内郁郎在“使用与满足”过程模式中指出，“人们接触媒介的目的是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这些需求有一定的社会和心理根源”，虚假新闻也正是因为这种使用与满足心理而滋生。一些新闻媒体工作者抛弃真实是新闻生命的原则，为了追逐名利不惜抛弃职业操守，一味追求新闻的“轰动性”“新鲜性”，自编自导的创造主观假新闻，造谣又辟谣，让所谓的“新

闻”越炒越火，不仅愚弄了公众，更是违背了应该恪守的媒介规则。2022 年 12 月 6 日，某个微博传出“金庸去世”的假消息，某知名周刊的一个编辑看到此微博，以该周刊的名义在网络上转发了类似内容的微博，由于没有注明转发，网友误以为是该周刊在核实后发布的信息，大量转发而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正是因为一些新闻媒介和从业者为了博关注或趋利的强烈目的性进一步造成了虚假新闻的日益泛滥，一些别有用心或有利可图的人会提供或散布形形色色的假消息，而新闻工作者若对于这些客观假新闻只是片面听取被访者的一面之词，忽视媒介的把关和社会责任，受利益驱动，不经核实地通过各种媒体传播给受众，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加之众多的视频创作者、博主、网红、平台主播们的参与，这种扩散会尤为迅速而广泛。最近的案例是胡鑫宇事件，当事情悬而未决时，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和猜测充斥网络，演绎和发酵形成巨大的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众声喧哗波及海内外，并引起公众的极度恐慌，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1.3 网络的无序性助长了公共空间的乱象

哈贝马斯把“公共空间”界定为一个面向实际和解的非强制性的交谈领域，指出公共空间具有解放的潜质。全媒体时代下人性的解放备受关注，公民通过网络媒体的各种平台表达观点，话语权得到了空前提升甚至无限制地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网络媒体的“去中心化”，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促进了信息的交互性和爆炸性传播，调动了公民的互动性和参与讨论的热情，形成舆情和舆论，这种舆情的载体实则反映了不同个体的思想和情绪宣泄，会无限放大负面效应，最终演变成舆论暴力。这种状态如不及时遏制，会使得网络环境每况愈下，造成公共空间的混乱并影响社会安定，甚至还会危害其他受众群体的心理健康和人身安全。2022 年 1 月 24 日，曾在网上发布寻亲视频并认亲成功的 15 岁男孩刘学州留下遗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刘学州的离世根源来自网络暴力，因为一些片面报道，部分网友以讹传讹，火上浇油，评判刘学州的长相、声音、做法，用最大的恶意肆意揣测刘学州。稚嫩的刘学州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茫然无措，键盘侠们的网络舆论暴力、亲生父母的二次伤害，还有孙卓、张洋洋的父母团聚，都让他不堪重负，最终心灰意冷的刘学州选择用死亡自证清白来对抗现实的残酷。网友有攻击性、侮辱性、诽谤性或煽动性的言论导致刘学州的自杀。由于网络传播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互动传播过程中，新媒体技术就成为网络暴力的主要力量。[3]网络平台提供了开放性、匿名性、相对自由性的言论空间，弱化了人们在现实社会里需要承担的伦理、道德、法律上的压力和约束性。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话语权越来越分散，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加之进入门槛低、转发评论便捷，会进一步放大网民的极端言论和不满情绪，演变为舆论暴力加剧网络公共空间的无序性。

1.4 新媒体的高速发展扩大了数字鸿沟

全媒体时代新媒体技术呈现出泛娱乐化、碎片化和技术特权等特征，新媒体知识沟不断加剧新媒体的“数字鸿沟”。目前我国传媒资源的布局十分不平衡，尤其是农村和城市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传媒资源占有量存在极大的差距。近年来中国网络用户的持续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农村网民占网民整体的 27.9%。“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中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其本身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且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4]信息化的超速发展，使信息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转化促动财富高速集聚，难以形成均衡合理的公共空间，正如物质财富上存在富裕与贫困的差异一样，在信息占有上的情形如出一辙，因经济窘迫而疲于奔命的人往往也是信息匮乏的人。[5]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公共空间的建构基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也会因传媒布局的失衡导致公民意见传达的阻滞，隔离于政府的意见传达，滋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引发公共危机导致和谐社会失去建构的基石。

1.5 媒体的逐利性阻碍了传媒公共话语领域建构

在当今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如何吸引受众眼球成为媒体们争相竞争的焦点。为了达到此目的，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诸多媒体都在使尽浑身解数搜集可以满足受众猎奇心理的信息，网络公共空间日渐泛娱乐化，肤浅空洞的娱乐内容充斥着网络公共空间，去迎合网民个体的娱乐需求，通过追求感官愉悦和短暂快感的娱乐性方法获取“热量”和“流量”。一些媒介甚至抛弃媒介规则，超越道德底线，严重危害到公共领域的建构。部分新闻工作者们完全抛弃了职业道德准则，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利益，逾越道德与伦理的底线，甚至报道中有许多内容涉及新闻侵权，愚弄了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侵犯了公众人物隐私权，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2. 全媒体语境下公共空间重塑的举措

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敏锐地察觉，电子媒介将日益成为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全媒体通过开放的、不断兼容并蓄的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的细分需求，丰富受众的媒体体验。全媒体时代下网络公共议题缺失、网络信息失真、网络无序性和非理性、网络共识缺乏以及技术与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侵蚀，使网络难以成为公共领域的成长空间[6]，网络公共空间处于解构状态。与此同时网络媒介的交流性功能日益呈现自由状态的沟通模式也解构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控制模式和组织关系，开辟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建立了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使交往的主体脱离了原位，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空间。[7] 现今网络公共空间的不断解构，亟待采取科学的举措进行重塑，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2.1 塑造规范的媒介环境净化公共空间

首先，媒介要秉持科学发展观的准则。媒介中包含经济、制度、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因此媒介科学发展的系统观要与社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保持一致，并形成良好的互动系统。全媒体时代，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信息生产倍量增加，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专业组织更应发挥媒介的协调和平衡功能，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人文关怀，注重传播内容的深度与品质，力求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亦能够繁荣文化、彰显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全面和谐发展。

其次，媒体要坚守规范和自律的原则。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信息传播群体扩大及信息传播者的不确定性对媒介和从业人员都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媒体对内要恪守媒介规则，坚守新闻的专业主义，杜绝虚假新闻，遏制负面信息，避免因逐利陷入新闻娱乐化的黑洞；对外要加强对信息的把关，利用信息过滤技术筛选信息内容，提高信息质量，通过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理性地引导公众，防止非理性的互动评论和无用及负面信息的发布，重塑良性的信息传播互动的网络公共空间，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另一方面媒介还要加强自律，坚守媒体的道德底线，注重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充分彰显出人文关怀。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伦理精神，以守则、负责的态度运用媒体，为公众作出表率。

2.2 培育社会共建公共空间

第一，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公共空间的发展。全媒体视域下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迫在眉睫。全媒体时代社会环境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加之公共空间中公众意见表达的自主性、草根性、互动性，使得公共空间鱼龙混杂，芜乱不堪。各种媒体中大量充斥的虚假信息、负面信息、娱乐信息、色情信息等导致公众意见表达失去理性，公共关怀日渐丧失，严重影响了公共空间的建构。因而，要让公民建立起成熟的公民意识和网络媒介素养，强化公民的理性思维能力，提升对话题的思辨深度，提高公民的话语行为自律意识，将这种自律意识提升到社会道德和伦理的高度，使公民在网络公共空间的话语行为从"他律"的状态进入到"自律"的状态。[8] 增强公民责任感和积极性，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蚀，逐步成长为守法、宽容、恕道、理性论事的文明公民，促进公共话语空间的发展，共建积极健康、向上向善、包容并蓄的网络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和谐公共空间。

第二，要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消除人治，充分突出民众作为社会主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效保证民众政治诉求渠道的畅通。[9] 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科恩提出了衡量社会民主发展的两个尺度，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10] 要实现这样的愿景，必须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建立隶属不同行业和阶层的民间组织作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充分利用全媒体优势共建公共空间，促成公共观念的生成，进而培育出适合全媒体时代发展的现代公民社会。

2.3 优化传媒布局 缩小信息鸿沟

首先，统一筹划不同地区间传媒资源的配置。优化传媒空间布局要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全媒体时代的发展进程中，持续推进传媒市场化、数字化、民本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同时，统一筹划农村和城市、沿海和内地、发达和落后地区间的传媒资源配置，弥合因网络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使之趋向于合理化，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兼顾传媒资源的均衡性。全媒体时代的高速演进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数字鸿沟""信息鸿沟"的出现，造成信息的失衡、财富的不均、舆论实力的悬殊。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传媒，理应提供给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开放的有完善制度保障的公共传媒，强化信息等资源的再整合与再配置，尤其是利用

公共传媒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探寻观念、需求、沟通的平衡点，使公共媒介真正成为他们“身体的延伸”，弘扬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普世之爱的道德伦理观，为弱势群体拓展更广的公共话语空间。

2.4 建立高效的预警监测系统处理公共危机

首先，加强信息舆论监督保障公民的权益。政府务必要加强网络公共空间的法治建设，监控并督促媒体主动提升引导能力和信息供给的水平。网络是开放复杂的系统，网络空间环境治理必须遵循“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安全为人民”的理念，强化安全内控和风险意识的培养。[11] 媒介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延伸，舆论监督中媒介可通过自身独有的资源和力量曝光社会事件，还原事实真相，既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公民的知情权，又适时地引导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为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传承社会文化，保障公民权益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建构高效的危机传播机制保障公共空间的安全。为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急需建立高效的传播预警机制，政府要加强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的风险沟通机制和相应的舆情应急治理策略，及时披露危机信息并消弭危机。当突发事件发生、危急状况突现时，媒介则需彰显社会责任感，注重与社会各界信息的传播和沟通，并及时向公众告之以实，晓之以理，发挥“稳压器”的作用，稳定社会秩序、预防社会恐慌、防止社会动乱，使媒介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

结语

全媒体语境下的数字化表达从多个纬度解构着公共空间，主流价值观被逐渐消解，传媒生态处于失衡的危险边缘。政府亟须对媒介资源进行统筹调控，强化相关从业人员媒介素养，加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塑良好公共舆论与良性的传播生态的互动格局。其中媒介的作用尤为关键，曼纽尔·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指出，网络所造就的新的认同力量正离析和瓦解原有社会的权利、中心和秩序等。[12] 在多元利益的博弈中，媒介协调和平衡的公共职能没有充分凸显，失去了表率作用。全媒体发展的价值原点和终极目标是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因此媒介必须借助其自身的建构功能和协调关系的职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指向标，消解其以往的负面影响，发挥社会“守望”职责和外化的净化环境功能，担当传播信息的职能，积极承担社会教化的重责，提升公民媒介素养和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引领公民以主流价值为核心，遵守普遍的公共话语伦理规范，力争黏和与重塑和谐安定的公共空间，实现社会各阶层的良性互动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有效整合，共建自由、民主、宽容和谐的美好社会。

参考文献

[1][英] 安东尼·吉登斯 . 社会的构成 [M]. 李康，李猛译 . 北京：三联书店，1998：16.

[2] 雷禹 . 网络危机传播机理及其管理机制的研究 [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0.

[3] 何小霞 . 新媒体技术与受众互动传播模式的发展探索 [J]. 记者摇篮，2019（9）：85-86.

[4] 周乾坤 . 新媒体背景下受众互动传播模式的发展策略 [J]. 中国传媒科技，2022（9）：69-72.

[5][美] 沃纳·赛佛林等著 .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M]. 郭镇之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72.

[6] 申建林，邱雨 . 重构还是解构 ——关于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命运的争议 [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46-154.

[7] 苏钥机，李月莲 . 新闻网站、公共空间与民主社会 [EB/OL].http：//flystar898.blogchina.com/.2004-02-16/2023-02-20.

[8] 宋平锋 . 哈贝马斯交往思想视域下的网络公共空间话语伦理研究 [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44-51.

[9] 魏杰 . 亲历改革 [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174.

[10][美] 科恩 . 论民主 [M]. 聂崇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2.

[11] 王琳 . 媒体空间治理的技术风险与应对策略 [J]. 中国传媒科技，2022（10）：68-71.

[12][美] 曼纽尔·卡斯特 . 认同的力量 [M]. 夏铸九，等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09-419.

作者简介：范慧君（1975-），女，安徽合肥，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媒介发展。

（责任编辑：张晓婧）